本版编辑：李少军
E-mail：t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049

学思录

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思想方法

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取得一系列丰功伟绩，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他掌握并运用了正确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思想方法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不断修正自己主张；善于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我们应该珍视这些重要的思想遗产，加以学习和掌握。

□ 赵　奇

毛泽东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够建立这样的丰功伟绩，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与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思想方法息息相关。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多位主要领导人，包括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等人，这些同志都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和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为什么他们都没有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而只有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除了其他一些主观与客观的因素以外，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毛泽东同志掌握并运用了正确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科学思想方法。

科学思想方法就是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现实问题做出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分析和认识，从中找出正确的结论。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科学思想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指导工人运动，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同志用来分析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指导中国革命，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今天，我们认真学习领会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思想方法，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毛泽东思想，提高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同志的科学思想方法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国内外学者也从多方面进行过研究和阐发。就我个人来讲，通过学习，对毛泽东同志科学思想方法的认识和领会，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方法。这是毛泽东同志科学思想方法中一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思想方法。这一思想方法，具有这样一些鲜明的特征：首先是不唯书、不唯上，坚决反对教条主义。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党校演讲时曾形象地讽刺说：“教条主义比狗屎还没有用。”对于中国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挥，毛泽东同志一直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中国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其次是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研究和解决问题。这一点充分体现出毛泽东同志特立独行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认清中国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的基本依据”。他是这样说的，也一直是这样做的。在中国革命早期，当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包括许多领导人都信奉共产国际关于依靠工人阶级在大城市取得暴动胜利、建立工人阶级政权的理论时，毛泽东同志却鲜明地提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并以此为根据，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对于中国革命来讲，毛泽东同志的农民革命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因为，正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思想，使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再次是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得出正确认识。在中央苏区时期，即使战事频仍，毛泽东同志仍然抽出时间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比如，1933年11月，毛泽东同志抽出近1个月时间，在江西兴国县长冈乡进行社会调查，对长冈乡的政治区划及户口、代表会议、选举、地方部队、群众生活等19项内容作了详细调查，形成了《长冈乡调查》，对指导苏区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观点，强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中共中央党校礼堂前广场的毛泽东全身塑像：《我们的老校长》

第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既不能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更不能成为唯经验论者。辩证唯物主义强调，事物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某些经验，在一地正确，在另一地就不一定适用。因此，一定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毛泽东同志特别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不拘泥于过去的经验。在环境、条件发生变化后，善于抓住新的主要矛盾，敢于做出新的决策。比如，红军长征时的“四渡赤水”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提出与国民党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都是生动的例证。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对这一思想方法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指出：“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

第三，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不断修正自己主张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不是军人出身，但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指挥千军万马，进行了无数重大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毛泽东同志能够根据战场上的形势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不断修正自己的指挥。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指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挺进中原，一举取得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优势。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打破敌人战略封锁、取得主动权的重要经验。为此，他曾多次致电粟裕，要求华东野战军主力渡江南进，千里直击到福建、浙江，给敌人以牵制。但粟裕经过分析，认为前景不明朗，表示反对。毛泽东同志在听取粟裕的报告后，马上修正了自己的主张，同意华野开展准备，进行淮海战役，从而取得了对国民党军队的又一次重大战役胜利。

第四，善于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概括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不仅善于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而且善于将这种分析和解决的过程、结果，上升到理论层次加以认识，从而提炼出重要的理论观点。他的一些重要著作，无论是《矛盾论》《实践论》，还是《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都给我们提供了光辉典范。

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时期，没有继续坚持这些科学的思想方法，犯了一些主观主义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错误。但我们不能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没有坚持这些科学的思想方法，就否认其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我们应该珍视这些重要的思想遗产，加以学习和掌握，并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行运用和检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不断增长智慧，才能在实际工作中少犯错误。

感受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

□ 陈华文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富的滋养和沃土，使中华文明绵延几千年而未曾中断。而任何一种文明在历史长河中能发展、壮大，并且走向成熟与辉煌，必定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作为支撑，中华文明也同样如此。中华文明中的传统价值观念，并不是哪一个人提出来的，而是在漫长的历程中逐渐孕育出来的。当中华文明的传统价值观念形成之后，对于中国历史的作用是巨大的。近来读到清华大学陈来教授的新著——《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受益良多。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弘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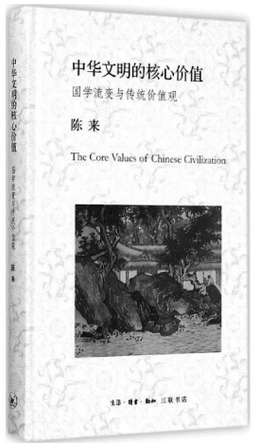
价值观是基于人的一定的思维感官之上而作出的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也就是人认定事物、辨别是非的一种思维或取向。价值观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历史性与选择性、主观性的特点，同时，价值观对动机有导向的作用，同时反映人们的认知和需求状况。在本书“中华文明的价值观与世界观”一文中，陈来教授简要梳理了中华文明演化脉络之后，对于中华文明内在的价值观发展进行了层层入理的剖析。孔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不少人误以为他就是儒家思想的开创者，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孔子本人的思想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周文明思想的继承者。陈来认为，“儒家思想的真正缔造者，是西周礼乐文化”。西周文明在经过夏、商之后的发展，形成比较稳定的精神气质，主要体现在“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天民合一的存在信仰和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儒家思想及其倡导的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自身连续发展的产物，体现了夏商周三代传行的传统及其形成的精神气质。儒家所奉行的核心价值观念，成为中华文明价值观念的核心。

崇仁和尊礼，最能体现儒家核心价值观念要义。在孔子之前，仁的内涵仅指对父母双亲之爱，但是孔、孟更为强调仁者爱人，仁渐渐升格为普遍的仁爱。另外，仁爱的对象也由原来的家庭，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爱护。作为社会中个体的人，如何领悟并践行仁之要义？那就是忠恕之道。所谓恕，正如同孔子讲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原则是充分尊重对方而不把自己的想法和主张强加于他人。在目前的社会交往中，这应该成为全球伦理道德中普遍遵循的原则。

谈到儒家思想中的价值理念，道德显然是绕不开的。道德不是空洞的言辞，而是在人与人交往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这些行为的共同取向则是礼。而礼最看重的就是相互尊重。虽说礼在中国文献典籍中很多种的解释，而汉语中常常提到的“礼尚往来”，则是强调双方交往中的某种规则和规范。中国历来都是礼仪之邦，虽然礼仪的形式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来的样态并不相同，但礼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陈来教授认为：“中华文明的礼是以敬让他人为其精神，以温良恭俭让为态度，以对行为举止的全面礼仪化修饰与约束为其目的的文明体系。”对于今人而言，礼不仅对个人道德修养的提高有其有现实意义，对整个社会精神文明层次提升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国际交往中，“好礼”则体现了尊重他国和人民的行为方式。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陈来教授认为，在经过几千年的变迁后，中华文明已经确定地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偏好：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冲突高于和谐。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观念中所强调的仁爱原则、礼教精神、责任意识、社群取向，以及对王道世界的想象与实践，贯穿于中国漫长的历史文化中，彰显出中华文明对关联性、交互性伦理的重视，以及对文明多样性的推崇。

当前，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文明交流、交融、交锋，承继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念，以整合、凝聚和提升中华民族的“精气神”，无疑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选择。作为拥有悠久文明的东方大国，中国更应当通过弘扬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念，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体现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提升全社会的民族归属感。



书名：《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
作者：陈来
出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4月出版

书海泛舟

书而思

中国社会风险治理的新路径

□ 杨　海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相互交织的时代条件下，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然而，发展带来的种种风险问题却不容忽视。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以灵敏的嗅觉捕捉到了现代社会涌现出来的风险。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指出，现代社会是一座文明的火山。现代风险是一种潜在的、不易察觉的风险，是一种系统性破坏的文明风险，它正以“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资本的逻辑、科层制体制以及“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三者相互交织，世界风险社会正在向人类走来。

尽管现代风险能够唤醒人类责任意识，并以此创新人生，然而，它对人类所带来的损害性影响是空前的。这种带有系统性破坏的文明风险有可能足以让整个人类走向毁灭。这种“启示录”般的警醒使人们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世界。在贝克看来，世界“风险共同体”已然成为全人类的历史命运。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大国崛起将会带来什么新的风险？邓小平早就说过，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正因为如此，解决发展起来之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更加困难。“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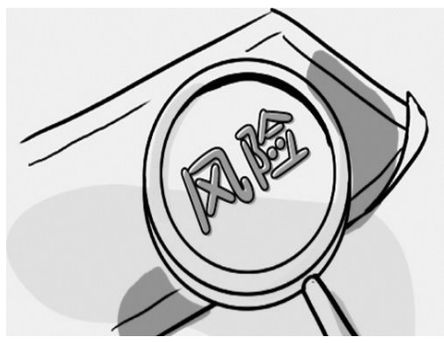
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多次强调，风险是发展的副产品。的确，当代中国正面临着整体性发展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在各个领域与方面都面临着转型与发展的风险。如从解放与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向公平正义的改革的转型，从投资驱动发展向创新驱动发展的转型，从国家主导向国家治理的转型，从文化自卑向文化自信的转型，从回应问题导向向提升话语权导向的转型，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向世界强国的转型，等等。在这一系列发展转型升级之中，随着体制与机制的不断变革与创新，各式各样的新风险亦接踵而至。

然而，贝克在分析世界风险社会的生成、表现与治理特点时并没有看到中国社会风险治理的独特性。也就是说，尽管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同处现代性语境下，都不可避免地遭受现代风险的困扰，但是，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治理逻辑与制度旨归上都会有较大的差异性。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风险治理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治理目标、治理路径以及治理机制上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迥然不同。当代中国社会风险治理坚持科学发展，重塑风险价值理念，通过对自身实践活动结果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自我校正以及自我调控的形式实现自由自觉的发展。在当代中国整体发展转型升级中，始终不渝地坚持进步与平衡相统一、创新与自律相统一、自觉与自信相统一、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系统治理与分散治理相统一等多种原则。以行为归化机制、发展约束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环境“强化”机制为主要治理机制。在风险治理的全过程中，并不纯粹以资本的逻辑为动力，而更多地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

当代中国的社会风险是一种结构性风险。当前，在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结构分化程度之深，速度之快，而新的结构整合机制却发育缓慢。这样，分化与整合的不同步、不协调、不一致则催化了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的生成与繁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当代中国整体转型升级中的风险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治国理政思想。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总目标，以打铁还需自身硬强调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人民福祉进一步凸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宗旨。这一整套框架体系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共同体。其中，这一体制机制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当代中国整体转型与发展中的风险治理问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强调问题倒逼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利用好动力机制、平衡机制、治理机制来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风险与难题，以此实现又好又快的和谐发展，以规避一系列社会风险。

虽然并不像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中国即将进入高风险社会，但在世界风险社会语境下，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何加快制度建设，推进理论创新，努力化解当今时代各种现代性风险，使当代中国能够经得起各种现代性风险的挑战，同时，也为和谐世界的构建做出积极努力，值得我们去研究、去思考。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5年第9期要目

本刊策划
净化政治生态
齐卫平　庄德水　彭穗宁　申恩威　李　拓　赵绪生　赵长茂

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抗日战争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　黄浩涛
德国和日本对待历史态度不同的原因——从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区别说起　马呈元

经济视点
共同治理是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方向　迟福林
更好发挥债券融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贾　康

改革纵横
新闻发言人制度改革如何再出发　王旭明
人力资源法治化与劳动关系规制　常　凯

治党论苑
推进党内激励工作规范化、科学化　中共中央党校第64期厅局级进修班课题组

社会治理
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实践困境与改进路径　蔡志强

热点观察
养老金投资为何不能选择美国模式　齐传钧

调查研究
苏南全国百强村经济发展与转型调查　彭智勇

读书观影
那些与股灾相关的40本图书（上）　李　朱

舆情分析
网络舆论中“躁狂”不得——中国舆情指数报告（7月份）　百度舆情研究院
当下中国网络舆论生态的十个问题　东　鸟